

语言研究集刊

江苏省语言学会 主编

第八辑

南京方言入声韵的语音层次——以宕江两摄为例

苏北方言古日母字

从常用字

江苏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简介

现代汉语单音节词的三叠式 略论汉语中的

汉语数词“两”的虚指研究

“控”词族的形成轨迹及语义场

古汉语名词词义引申的义素运动模式

汉字“哥”的古今语义变化

现象的优选论阐释

英语惯用语变异的语用学考察

主谓结构无标记转指的认知分析

两岁段幼儿“给”核句的习得

现代汉语情态构式的表达特点

紧缩构式的语块构成与标记类型

近代汉语“被”字句

义分析的理论框架和程序

新版《现代汉语词典》

《通用规范汉字表》的不规范现象

《同音略解》中“門”简化情况的考察

从《汉武帝》配音

关于日语里中国人名的“现代中国语”

莫言小说词语修辞的常与变

同文搜索与序列比对相结合的应用

语言知识库“知网”的概念义原系统

《广韵》重纽在双

《十驾斋养新录》中的方言译音材料

予词语订补《汉语大词典》之疏失

《中原音韵》考释二则

“齿白唇红”的出处及与“唇红齿白”的关系

《吐鲁番出土文书疑难词语考辨》补议

梵志诗校辑》补苴

吴金华先生研治《三国志》的特点与贡献

尔雅诂》初探

良师益友 业精于勤:赵航先生逝世周年祭

孟高棉语中的次要音节演变研究

汉—南语系与汉—高语系、汉—博语族与汉—藏语系

语言研究集刊

江苏省语言学会 主编

第八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集刊. 第八辑/江苏省语言学会主编. —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499-5468-1

I. ①语… II. ①江…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7236 号

书 名 语言研究集刊(第八辑)
作 者 江苏省语言学会
责任编辑 徐宗文 周敬芝
装帧设计 张金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镇江中山印务有限公司(电话 0511-86917816 86917818)
厂 址 丹阳市朝阳路1-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4.5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5468-1
定 价 80.00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目 录

吴金华先生研治《三国志》的特点与贡献	王华宝	1
良师益友 业精于勤:赵航先生逝世周年祭	班吉庆	12
南京方言入声韵的语音层次——以宕江两摄为例	顾 黔	17
苏北方言古日母字的今读类型及演变线索	冯青青	27
徐州话两字组变调的自主音段音系学解释	毛洪波	38
从常用词试论《醉醒石》的山东方言色彩	高玉蕾	44
“江苏省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简介	汪 平	53
略论汉语中的“离合词”	董志翘	58
现代汉语单音节词的三叠式	方 寅 段业辉	68
汉语数词“两”的虚指研究	林 纲 李 娜	79
“控”词族的形成轨迹及语义演变	邱雪玫 梅启梦	93
“哥”的古今语义变化	朱明慧	105
“齿白唇红”的出处及与“唇红齿白”的关系	徐宗文	110
主谓结构无标记转指的认知分析	郭圣林	115
两岁段幼儿“给”核句的习得轨迹	王 彤 李葆嘉	125
现代汉语情态构式的表达特点	范 伟	134
紧缩构式的语块构成与标记类型	皇甫素飞	144
近代汉语“被”字句主语的类型	刘 进	154
句子意义分析的理论框架和程序	司联合	165

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求瑕	柳士镇	174
以朱子词语订补《汉语大词典》之疏失	李 申 刘兴忠	185
《通用规范汉字表》的不规范现象	牟晓明	200
《同音略解》中“門”简化情况的考察	陈立中 王婷婷 常 亮	206
从《汉武帝》配音误读论异读词的一音化	赵贤德	215
关于日语里的中国人名“现代中国话读音”	倪永明 倪典夏	222
莫言小说词语修辞的常与变	江 南	231
英语惯用语变异的语法隐喻例释	童 颖	241
词汇阻遏现象的优选论阐释	方小兵	251
《中原音韵》“戡”字考	吴葆勤	260
《广韵》重组在汉语方言中的语音投射	张竹梅	268
《十驾斋养新录》中的方言译音材料与音韵研究	乔秋颖	279
《吐鲁番出土文书疑难词语考辨》补议	赵家栋	289
《王梵志诗校辑》补苴	柳咏梅 李 琦	299
海门徐孚吉《尔雅诂》初探	万久富	307
古汉语名词词义引申的义素运动模式	何 书	313
同文搜索与序列比对相结合的版本异文发现算法	陈小荷	322
语言知识库“知网”的概念义原系统	李 斌	332
孟高棉语中的次要音节演变研究	高永奇	345
汉—南语系与汉—高语系、汉—博语族与汉—藏语系以及默认 的藏缅语系假说	[荷兰]德利姆 著 李葆嘉 李 艳 译	351
编后	李葆嘉	384

吴金华先生研治《三国志》的特点与贡献

王华宝

提 要:本文从四个方面,述介吴金华先生研治《三国志》的特点与贡献。一、以词语考释为主的《三国志》语言学研究;二、以文本校勘为主的《三国志》文献学研究;三、由实践向理论转化的《三国志》综合研究;四、培养人才,开拓创新,将《三国志》研究推向时代高峰。期待学人全面了解吴金华先生的学术风范与成就,继续推动《三国志》整理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吴金华;研治《三国志》;特点与贡献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教授在《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三国志》研究”一节中^[1],历数现代《三国志》研究专家十余人,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是其中最后且最重要的一位。

吴先生1943年11月27日晚生于南京,因次日报童高呼“金华大捷”,尊翁即以“金华”名之。其师徐复(鸣谦)先生赐字“企玄”。吴先生读《蜀志·向朗传》“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慕其老而笃习,故自号“慕朗居士”。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8年分配至徐州地区赣榆县的中学任教。1978年考回母校,师从鸣谦先生,学业精进。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95年调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2013年6月2日驾鹤西去。

吴先生致力于汉语史与文献学研究,侧重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与《三国志》整理研究,所关注的领域是训诂学与校勘学。学术专著有《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古文献研究丛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凤凰出版社2008)等。如今,《三国志今注》(凤凰出版社)已出初校样,点校本《三国志》(中华书局)的修订工作已

作者简介:王华宝,文学博士,现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东南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献整理与研究、古代汉语。

打下基础。回想先生在2007年,即有“《三国志》整理研究系列”计划,包括:《三国志》新校本、《三国志简注》、《三国志》新注新译、《三国志》文本系统研究、《三国志专题索引》、《三国志大词典》以及《三国志》研究概论等。这些系列性项目,或有部分样稿,或有部分成果,竟不能亲自完成,世人岂不为之一恸!

吴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亲授《史记》、训诂学、语法学等课程。30年来,面聆先生开示不计其数,谈《三国》更是家常便饭。此从四方面述介先生研治《三国志》的特点和贡献,记叙先生准备做而未及做、或未及完成的一些工作,期待学人全面了解先生的学术风范与成就,继续推动《三国志》整理研究的深入。

一、以词语考释为主的《三国志》语言学研究

吴先生于1978年师从徐复老先生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读书期间即担任语言学家、三礼学家钱玄(小云)先生的助教,为中文系本科生辅导“古代汉语课程”。并协助徐复先生查证《汉语大词典》编纂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料卡片,在“斋舰”“顾返”等语词研究方面受到称赞,徐先生在《读〈义府续貂〉识语》中就有提及。^[2]

吴先生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三国志》研究的,早期的研究即以语词考释、语法研究为主。发表了《〈三国志〉解诂》、《〈三国志〉考释》、《试论“R为A所见V”式》、《〈三国志〉拾诂》、《〈三国志〉词语札记》、《〈三国志〉词语简释》等十多篇文章。这些厚重的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赞赏,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这些文章以及一些未刊的研究成果,达700余条,汇为先生的第一部专著《三国志校诂》。后学写过两篇小文介绍此书^[3],认为该书的特色是“重视发明、讲求实用”。

(一)新校新释。(1)传讹至今,尚无人校理者,先生为之校定。(2)古义时语,迄今未见注释或云“未详”者,为之训释。先生的独到创见,随处可见。

(二)辨证误校、误释。(1)古今校者有误处,为之辨证。(2)又有古今注家误释,或辞书误解者,为之辨误。

(三)释疑祛惑。古书疑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者,以及古今校注者致疑之处,先生列举翔实的史料,为之辨证,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颇具卓识。如第145页《魏志二十六·满宠传》“樊城得水”,或疑“得”一作“待”,或疑皆非是,先生以为“得”字不误。释疑祛惑方面,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博考典籍,所校释多成定论。

(四)申证前说。

(五)中华书局标点本标点不当,影响文义者,为之辨正。而广征博引,考校翔实,训释精允;校勘多揭出其致误之由,训释多连类而及,举一反三,则成为《三国志校诂》的基本特色。

此外,该书择录卢弼《集解》问世以来研究整理《三国志》的成果 101 条,有的条目后附有先生自己的观点,成《三国志考释集锦》。书末附《三国志标点本两版校记》,举出 67 处形成阅读障碍的文字,予以说明、辨证。这种工作显示出先生兼收并蓄、充分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方便读者的严谨学风。该书也起到了集成作用,对于读者总体把握《三国志》研究与整理状况很有益处,后来获得了“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

从 1978 年到 1990 年前后,先生充分运用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全方位地开展《三国志》的语言研究,并对标点本存在的标点问题做了初步梳理,解决了大量问题。1995 年调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又有编入《古文献研究丛稿》的十余万字的《校诂外编》、《校诂订补》、《校诂外编补正》等文。2000 年,完成上海市社科基金资助科研项目《三国志语言研究》,将考释与校勘工作推向深入。此外,跟随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从事《三国志》异文研究、成语研究、与中古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等,也都融入了先生的心血。

需要强调的是,先生的《三国志》语言研究是与中古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先生认为,在“中古汉语”研究中,《三国志》不愧是大型的优质语料库,无论选择语义学、语法学、语音学的什么课题,都能提供丰富的语料。先生在《〈三国志〉语词笺释》中认为:

我们的目光常常投向蕴藏于《三国志》的中古语词,于是便产生了如下三点印象。印象一:新词、新义层出不穷;揭示这些内容,可以大幅度增添汉语史研究的鲜活语料,有助于填补大型辞书的诸多空白。印象二:误读、误注、误译的现象不胜枚举。讨论这些内容,可以丰富古文献学的研究资料,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研究的学术水平。印象三:要揭示上述内容,必须在宏观考察的背景下,开展以《三国志》本体研究为基础的个案分析。^[4]

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古汉语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注重创新、注重方法、注重深度”的学术理念,也受到学术界的赞扬。

二、以文本校勘为主的《三国志》文献学研究

训诂与校勘本是难以严格区分的问题,在先生的研究中也常常是同步进行的,如《〈三国志〉标点疑》、《三国志校点拾疑八则》^[5]。但从对材料的运用与成果的呈现来看,在不同时期还是有所侧重的。先生在《三国志丛考·弁言》中谈到:

《校诂》是 1987 年撰成的,那时我还没有全面调查过《三国志》的七种重要版本,还没有悟出陈乃乾《三国志》校点本(中华书局 1959 年)的误文往往来自金陵

活字本。

此后,则进行了系统的《三国志》文献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为做集大成式的校注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代表性成果《〈三国志〉斟议》^[6],洋洋洒洒 27 000 字,文分六部,例举九十,是一篇校勘学的经典文章。文本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汇为先生的另一专著《〈三国志〉丛考》。

在《三国志》文献学研究方面,先生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通过对以前集大成著作的研究,肯定已有成绩,指出其中不足,有了系统、全面校注的计划。先生在《三国志丛考·弁言》谈到:

二十世纪是《三国志》整理研究成果层见叠出、异彩纷呈的时代。仅就《三国志》文本的校理而言,完成于三十年代的重要成果就有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 1955)、卢弼《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 1957)、张元济《三国志校勘记》(商务印书馆 1999)三种。毫无疑问,从文化学术史的角度深入认识这些成果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是我们不断推进研究起点的重要途径。

先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关于易著,先生发表《略论易氏〈三国志补注〉》、《易氏〈三国志补注〉今证》揭示其历史贡献和实用价值,发表《易氏〈三国志补注〉评述》揭示其不足。关于卢著,先生则有 65 000 字的长文《〈三国志集解〉笺记》^[7],评价《集解》:

汲取了历代集解式著述的丰富经验,展示了广采众善的博大气象,体现了筚路蓝缕的创新精神,显示出有疑则阙的治学态度。

在肯定其为里程碑式的巨著,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的同时,指出三点问题:1. 在版本的取舍上似乎带有情绪化色彩;2. 不熟悉语言文字的学问;3. 在引证文献上还有许多空白。

二是通过对《三国志》版本系统的梳理,揭示出校点本的工作底本是金陵活字本。1989 年下半年,岳麓书社约请先生整理《三国志》。先生对《三国志》版本系统做了深入研究,对传世的几十种传本,按照抄写刻印的时代及其形态等做了分类,分别指出其源流与价值,并取得一些新的成果。如揭示出“权威本”中华书局校点本以四种版本择善而从,而以清同治六年金陵书局活字本为工作底本的事实。这让学术界对校点本的“致误之由”有了清晰认识。

1990 年,岳麓书社推出了先生以商务印书馆据宋绍兴本、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

印的百衲本为底本,以后出旧刻通行本为互校本的《三国志》新整理本。从《出版说明》可知,岳麓版《三国志》在文字方面,订正讹衍脱倒之处甚多;在标点方面,则大部分因袭了校点本,只有 600 余处有所不同,所做工作主要是存异、匡谬、补缺和加工。在印刷 8 次累计印数达 158 000 册之后,先生又进行了认真修订。先生在《修订后记》(1999)中认为:

学术事业是没有止境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资料总是把老工作推上新台阶,岳麓本的修订也不例外。……今天从事《三国志》的校勘,比以往拥有更多的优越条件。一是可参考的资料比过去丰富;二是又有幸读到一些有关的新论著,受到不少新的启发;三是电脑时代的到来,使我们的研究具备了比过去更便利的方法与手段。

因此,岳麓本的修订工作取得较多成果,改动达 900 多处,使此新整理本更加完善。

先生全面系统整理《三国志》文本,梳理版本系统,也为此后开展点校本《三国志》修订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重视出土文献和已有成果,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先生一直重视新资料的利用和老资料的新利用。如《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初探》^[8],对残存的 375 个字进行充分的运用,肯定其“确有‘一字千金’的价值”,并对另外 3 种晋写本残卷也做了一定探讨。此外,利用日本古写本《群书治要》解决了一些校勘与语言研究方面的问题。

先生对学术研究动态非常关注。试举一例。2012 年 12 月 3 日收到先生邮件,附件是先生的讲义《〈魏志·倭传〉助读》(六讲),计 78 000 字。《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三国志》12 册,巴蜀书社 2012 年出版,市场上尚未发行,而先生文中已有评说:

前不久,看到杨耀坤先生等校勘注释的《三国志》,其中也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杨先生是我钦敬的《三国志》研究专家,他的《今注》严谨弘博,跟他的旧著《陈寿评传》等等一样,质量很高,当今罕见其匹,读了获益匪浅;但这里的“欲”字是不是一定要改?我有点疑问,可惜现在不能当面请益,只好把浅见记在下面。

这也验证了先生平时所言,“四川人《三国志》研究水平很高,要关注他们的成果”。

四是主持点校本《三国志》修订工作,并对新世纪如何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做了大量思考。先生在修订岳麓书社版《三国志》的同时,于 1999 年 8 月修订旧稿《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修订刍议》,发出修订点校本的倡议,这在全国来说当属最早。

先生在宏观观照与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修订原则、方法和具体的工作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对推动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全面修订具有一定作用。此文最先发表于由后学担任责任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2001)中。受先生学术理念的影响,我也于2002年撰写了《〈史记〉新整理本刍议》^[9]一文,认为《史记》点校本也存在较多问题,同样需要修订,作了学术上的响应。

2007年5月,先生受聘主持由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暨中华书局联合立项的“点校本《三国志》”的修订工程。笔者参加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一次工作会议,又有机会面聆先生教诲,共游香山。如今《三国志》修订样稿已获通过,只是先生不能亲自完成修订了。其挚友汪维懋先生感叹:

你通晓汉魏六朝语境、熟悉佛学语言,从语言学家、文献学家的角度研究《三国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你就这么走了,把这些新发现、这些新成果、这些将要解决的疑难问题,统统又交回给历史,统统又变成不可知的问题留给了后人。后人要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又不知要走多少弯路、付出多少艰辛啊!

但我相信,有《三国志整理研究长编》在,有先生仙逝前一个多月撰写的《点校本三国志修订细则》等在,有先生培养的研究团队和弟子们在,有先生的哲嗣吴葆勤博士在,在中华书局的有力领导与协调下,修订工作一定能高质量地完成。先生所播撒的《三国志》研究种子,必然会开花结果。

三、由实践向理论转化的《三国志》综合研究

先生长期从事语言研究与文献整理的实践工作,到复旦大学后,更加重视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意识地运用理论方法,对各种现象进行归纳总结,从宏观上来重新审视一些老问题。如发表《新世纪之初〈三国志〉校勘问题的思考》等文,作题为《全球化视野中的古文献学》^[10]等演讲,做《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古汉语研究”》等讲座。在《〈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举要》中指出:

一位严谨学者的力作,一项全球化视野中的专题研究成果,一部充满新意而富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总是有许多值得读者尤其是同行的读者细细品味的内容,倪永明博士的《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一书就是这样。^[11]

先生并对古籍今注今译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在《古文献问学丛

稿·序》中提出：“传统的考释学，特别讲究本证与旁证的互相支撑；西方的阐释学，特别强调整体和局部的双向循环。”^[12]又应汉学家、挪威科学院院士、奥斯陆大学何莫邪(Christoph Harpsmeier)教授之邀，共同主持《〈三国志〉中英文对照译本》项目。

先生曾有编纂《三国志大词典》的想法，故对张舜徽主编的《三国志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做过认真研究，撰写了《〈三国志辞典〉商兑》^[13]一文，“所讨论的问题只侧重于辞书的立目与词语解释两个方面”，分为十二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先生在研究工作中非常注意对前人成果的尊重，对别人的贡献给予应有的评价。在该文结尾，先生写道：

最后，我们还要强调说明一点，即山东教育出版社的《三国志辞典》为二十世纪专书辞典的园林增添了新的景点，对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我们认为，在充分认识其新贡献的同时，结合某些值得商兑的问题进一步探索辞书编纂的难点和盲点，会使这部《辞典》更富有利用价值和启发意义。文中恐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先生还将《汉语大词典》与《三国志》相关的所有条目做了全面考察，发表了《〈汉语大词典〉书证商榷》、《〈汉语大词典〉商补》、《〈汉语大词典〉中有关文献考察的若干问题》、《〈汉语大词典〉商订八题》等系列论文^[14]，揭示其不足与失误，全方位地提出修订意见，并第一次提出且论述了汉语辞书中“假目”“误目”“疑目”等特殊现象。可以说，这些均发人之所未发，对辞书编纂具有指导意义。

先生的《三国志》研究，早已在语言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精熟史书体例、三国史事及文化习俗，走向理论与综合研究。如 2010 年的撰写的《〈三国志〉的叙事、评议与抒情》、《关于“曹操墓”热议的述评》等。最后半年所写的系列文章《三国志发微》之一《陈寿详略之笔与〈三国志〉的繁简之处》，其《目次》为：一、“详录‘虚实难明’的陆凯遗表”；二、“‘荀勖’仅见《上诸葛亮集表》”；三、“《蜀志》、《魏志》屡记刘备帝王之相”。《三国志发微》之十二是《〈三国志〉何曾虚饰王平？——刘知几〈史通〉“不可轻信”举例》。还有与《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等。这些文章，或考证史实，或研究史笔，或议论史评，或品鉴文学，真知卓见，层出不穷，令人叹服。

当然，先生对与《三国志》有关的《后汉书》、《世说新语》、《建康实录》等文献，也做过精深研究。其专著《世说新语考释》，更是得到学术的一致好评。先生对佛经词语研究、对辞书编纂等有很大的贡献，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综合研究的学术理念。

四、培养人才，开拓创新，将《三国志》研究推向时代高峰

先生是“章黄学派”的传人，也是中华学术的热心播火者。先生因协助徐复先生

创办南京师大古文献专业有突出贡献,1985年9月获省政府授予的“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因教育工作有突出贡献,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因学术研究有突出贡献,1992年,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颁发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8年受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据何凌霄所撰《吴金华先生传略》,除联系博士后人员8位以外,已招收海内外博士生34人,硕士生12人,可谓吴门之下人才济济。其中,有不少博士生撰写的是与《三国志》有关的学位论文。已出版的有王文晖《〈三国志〉成语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苏杰《〈三国志〉异文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倪永明《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凤凰出版社2007年)、马丽《〈三国志〉称谓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王彤伟《〈三国志〉同义词及其历时演变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等。另外,还有博士后储泰松《〈三国志〉裴松之音注浅论》、季忠平所译《吐鲁番、敦煌发现的〈三国志〉写本残卷》(片山章雄撰)、陈健梅硕士论文《裴松之年谱》(2003年获上海市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邓军《〈三国志〉代词研究》(2001年博士论文)、崔泳准《中韩〈三国志〉今译与古汉语专题研究》(2003年博士论文)、阎玉文《〈三国志〉复音词研究》(2003年博士论文)、萧瑜《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用字研究》(2006年博士论文)、何凌霄《〈三国志〉专名研究》(2009年博士论文)。^[15]何凌霄博士认为:“先生学术视野开阔,治学不主一家,由古及今,自东徂西,兼收并蓄,善采众长。先生的治学理念亦贯穿于弟子的学术成果中。”南京师范大学何亚南教授的博士论文《〈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16],也曾经得到先生的帮助。

先生曾主办“《三国志》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11月中旬)、与苏州大学联合“中古汉语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1月8日至11日),为推进学术不遗余力。后学在先生指导下,曾撰写《南京图书馆藏〈三国志〉版本简论》^[17],参加复旦大学的《三国志》研讨会,多了一次学习的机会。

先生投入了大量精力培养学生,对后辈有着很高期待。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先生还编写了《〈魏志·倭传〉助读》(六讲),“旨在通过《魏志·倭传》的研读,了解古文献研究和古汉语研究中的必须注意的问题,跟共读的同学一同寻找新的、前沿性的、原创性的研究课题”。

先生还有许多计划要做的事,《三国志汇校集释》就是其中一项。2012年,先生曾来信商议此事,嘱做方案草稿,我曾呈交一份近3000字的初稿。关于课题研究的意义及研究现状评述,当时写道:

20世纪30年代,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结合个人的成果,编纂为《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中华

书局1959年出版的《三国志》点校本,就是在《集解》提供的学术基础上推出的“权威本”。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周一良《三国志札记》,张元济《三国志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9),赵幼文遗稿、赵振铎等整理《三国志校笺》(巴蜀书社2001)等,或考订名物制度,或训释词语,或进行校勘,或研究版本等,均取得一些成绩,是我们不断推进研究起点的重要资源。然而遗憾的是,各书校注遗误不少,或版本取舍不当,或疏于语言文字考释,或引证文献有误,或已有成果吸收不足等,未能如意处仍多。约略统计,人名、地名、史实、典故、语词训释、标点之误等数以千计。从学术史角度看,现已过去多年,这些成果多有不足,订补论著也多而分散。借鉴乾嘉考据学和现代学术方法,选录前贤和今人可信的成果,融入吴金华教授及其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对《三国志》做一全面的汇校集释,推出一部代表21世纪《三国志》学术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书,是非常有必要的,且是可行的。

在结语部分写道:

以上成果和积累的经验,收集的研究资料,以及《三国志》整理研究最强的学术带头人和处于领先地位的学术团队,都为《汇校集释》创下了独有的学术条件,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提供了能够实现的学术保障。

如今最强的学术带头人不幸仙逝,此类重大课题,不知何时何人能够完成了。

先生在《三国志》研究方面,取得了蜚声海内外的令人敬佩的成就。这与先生语言学与文献学的造诣及其二者的相互结合,与先生对史书体例、三国史事与文化习俗的精深理解,与先生的学术理念等是分不开的。

先生在《跨世纪的徐先生》^[18]中阐述:

在学术研究上,徐先生常常提到的字眼是‘新、博、通、专、精’。假如我没有误解的话,那么,在这五位一体的治学要诀中,‘精’是要诀的核心;如果在上述五项中偏重某一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就难免出现偏差,比如只‘博’不‘专’则流于浅薄,只‘专’不‘博’则难免狭隘,等等。

在《训诂学家的乐趣——徐复先生二三事》^[19]中写道:“(徐复)先生最大的乐趣,在于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不断地发现训诂的疑点、盲点和难点,并不断地解决有关问题。”了解吴先生的人都知道,其实这也是夫子自道。就如《企玄室记》所说:“企玄之学不在玄,在乎创新之义也。创新之作,得之静而出之勤也。”明确学术的要义是“创

新”,实现“创新”的途径是“静”与“勤”。

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五次修纂工作会议”(2013年10月20日)上,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枚之先生沉痛地说道:

《宋史》主持人裴汝诚先生、《三国志》主持人吴金华先生因病去世。他们都是我们修订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人物,对古籍整理事业,对修订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纪念的。我们要铭记他们的精神,朝着我们共同的方向,坚定、踏实地前进。

大家铭记的正是这种绵延不绝的献身学术精神。

注释

- [1] 王子今 2002:《20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328—339 页。
- [2] 徐复 1990:《读〈义府续貂〉识语》,收入徐复《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 367 页。
- [3] 王华宝 1991:《〈三国志校诂〉述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249 期。王华宝 1995:《重发明 讲实用》,《文教资料》年第 2 期。
- [4] 吴金华 2001:《〈三国志〉语词笺释》,收入吴金华《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 147 页。
- [5] 吴金华 1982:《〈三国志〉标点献疑》,《中国语文通讯》第 3 期。吴金华 1984:《〈三国志〉校点拾疑八则》,《中国史研究》第 4 期。
- [6] 吴金华 2000:《〈三国志〉斟议》,收入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161—197 页。
- [7] 吴金华 2000:《〈三国志集解〉笺记》,收入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53—150 页。
- [8] 吴金华 1987:《晋写本〈魏志·臧洪传〉残卷初探》,《古文献研究文集》第 2 辑(南京师大学报年增刊)。
- [9] 王华宝 2004:《〈史记〉新整理本刍议》,《史记论丛》(中国史记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又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与赵生群共同署名)2002 年第 6 期。
- [10] 此为吴金华 2003 年的讲演标题,未单独发表。部分内容见王华宝《〈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专业成立二十周年暨学术讨论会〉综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3 年第 11 期。
- [11] 吴金华 2008:《〈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举要》,收入吴金华《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凤凰出版社,第 93 页。
- [12] 吴金华 2009:《古文献问学丛稿·序》,载王华宝《古文献问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
- [13] 吴金华 2001:《〈三国志辞典〉商兑》,收入吴金华《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 187—207 页。
- [14] 吴金华 1995:《〈汉语大词典〉书证商榷》,《南京师大学报》第 3 期。吴金华 1997:《〈汉语大词

典》商补》，《南京师大学报》第1期。吴金华 1998：《〈汉语大词典〉中有关文献考察的若干问题》，《文献》第3期。吴金华 1999：《〈汉语大词典〉商订八题》，《辞书研究》第3期。

[15] 见何凌霄《吴金华先生学术年谱简编》，载《吴金华集外集选编》（未刊稿，2012年3月8日印本），第478页。

[16] 何亚南 2000/2001：《〈三国志〉和裴注句法专题研究》（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论文，导师柳士镇教授），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7] 王华宝 2003：《南京图书馆藏〈三国志〉版本简论》，《古籍研究》第1期。

[18] 吴金华 2004：《跨世纪的徐先生》，载《朴学之路——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 吴金华 2006：《训诂学家的乐趣——徐复先生二三事》，《文汇读书周报》9月1日。